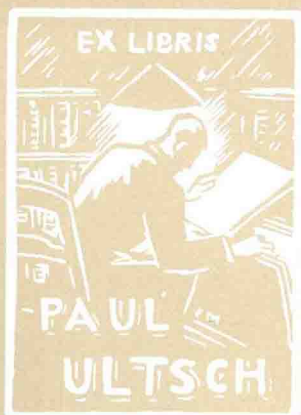


書業尋道

翟德芳 著

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

翟德芳 著

書業尋道



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书业寻道 / 翟德芳著. — 北京 :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, 2014.5

ISBN 978-7-5000-9339-8

I. ①书… II. ①翟… III. ①图书出版—出版工作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G239.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9881号

书名题签: 徐俊

责任编辑: 郭银星

装帧设计: 南昱

责任印制: 徐继康

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: 100037 电话: 010-88390093

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北京金舵手世纪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作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 印张: 21.5 字数: 235千字

2014年5月北京第1版 201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00-9339-8

定价: 58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我的书缘、书情、书生涯（代前言）

“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？”时间过得快，从20岁上大学，24岁踏入工作岗位，弹指间32年过去了，不经意间自己已经是55岁的人了。回首自己从一个农村少年成长为著名出版社负责人之一的历程，不能不感到是知识给了自己丰厚的营养，是读书伴随着自己的成长。想到这里，过去那些点点滴滴的与书有关的往事便如潮水一样奔来眼底。

我的启蒙

人生阅读肯定要从识字始。我的阅读史要回溯到50多年前。具体记不清了，但是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，就是父亲的逝世。我的父亲是在我4岁时离开我的。那时正值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，转过年来就是一个丰收年，为了防止饿极了的人们偷食未成熟的玉米，父亲接受了“看青”的任务，就是白天晚上在田地里巡逻，守护未上场的庄稼。东北的秋天，昼夜温差大，父亲一件棉大衣，往往是一夜不回家，坚持巡逻到天亮。一个秋天下来，玉米倒

是未受损失，可庄稼上场后，父亲就喉咙发炎，倒下了。从此一病不起，半年后就走了。那时的我只有4周岁，比家里火炕的炕沿高一点点，至今保存的一点记忆是，我站在地上，看着躺在炕上的父亲凹下去的眼窝。所谓幼年丧父，这个场景如此鲜明地定格在我的幼小记忆里，以至于童年的其他记忆反而淡化了。

按母亲的说法，父亲的去世是成全了我的读书。因为照父亲的性格，是不容许儿子不干农活而去读书的，他的儿子一定要是干农活的好手，如果他还活着，我就未必能够读那么多的书。也确实，父亲的去世，使我家的生活更困难了，但母爱的滋润却使我得到了意外的收获。说到这里，要多讲几句我的母亲。父亲去世，家里四个孩子，我最小，4岁，哥哥7岁，二姐12岁，大姐17岁。正上高中的大姐此时因为肺结核而辍学在家，父亲去世，她有病体拖累，不能做别的，母亲便让她照顾家务，自己到生产队里干活挣工分。当时母亲已经40多岁了，又有胃病，按说是不能干重活儿的，但是，在那个年代，我们这个翟姓本就是村里的孤姓，如今又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，没人挣工分，就没有饭吃了。父亲去世的第一年，我们家里没有挣够领口粮的工分，主事的队长就把我家的口粮扣住，不分给我们。因此，母亲只好拖着病体，每天下地，和壮劳力一样泥里来水里去，挣工分养活我们几个，几年后，累得胃溃疡严重，手术切去了四分之三的胃。好在过了几年，二姐16岁了，小学毕业，就不再读书了，回来帮助母亲，家境才渐渐不那么困难了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养病在家的姐姐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，闲来无事，便教我认字。而童年的我，还真的是对文字情有独钟，基本上是教过的字便过目不忘。

认得几个字，便要找东西看。可那时哪有给小孩子看的读物啊！这也难不倒我。我的一个习惯就是去到哪里，便去看人家的糊墙的报纸，从那里寻找知识。辽东的农家，都是土坯砌的房子，屋内抹泥，为了亮堂一些，就在泥墙上裱糊一层报纸。想想也怪有意思的，一个小孩子，到了别人的家里，也不玩耍，只顾盯着墙上看。站在地上看不够，还要爬到人家的炕上，伸着脖子看高处的文字。从报纸上，我知道非洲，知道非洲有个刚果金，还有一个刚果布，什么黑人反对殖民侵略；知道印度支那战争、印度尼西亚排华，什么吴奈温苏哈托。至今记忆犹新的是，我家后面不远，就是1958年大办公共食堂时的生产队食堂。食堂兴旺时做了装修，不仅土墙糊上了报纸，甚至用报纸吊了顶。食堂停办有几年了，这里也没住人，里面堆满了稻草。我认得几个字后，这里就成了我的乐园。那些报纸也不知是从哪里弄来的，竟然还有几张少年报纸，上面花花绿绿，深深吸引了我。一有机会，我就爬到稻草最上面，去看棚顶那些报纸。我对数字不感兴趣，只看连载的童话和插图，什么菜青虫啊，蚂蚁寒号鸟啊，地球宇宙啊，等等。从这里，我知道了瓢虫（我们当地叫花大姐）有七星和二十八星的区别，还知道后者才是害虫。

今天回想起来，那时认字的热情真高啊！由于我上学前已经认识不少字，在左邻右舍小有名气，大家都说我聪明，哪怕在后背或头顶画个字，我都认识。也因此有不少人都来试验，那时识字的人少，画出来的字也简单，我基本上都可以说出是什么字，故此传得更厉害了，而我自己，为了保持荣誉，也想设法去认识更多的字。这样两三年下来，我也认识了千八百个字了，以至

上小学时，发下来的课本我基本上可以通读，只是个别字的读音需要老师纠正一下。我刚上学的时候，还是复式班，一个教室里，坐着两个年级的学生，等我上二年级的时候，已经可以在语文方面帮老师辅导一下一年级的小兄弟们了。不夸张地说，从小学到中学，语文这门课程，基本上我就是“免修”的，新课本发下来，我把内容翻一下，基本就是找一下哪几个字我不认识，哪些课文我没看过，因此需要请教老师一下，如此而已。

小人书与“大书”

我也不幸！生于大跃进的1958年，两岁便赶上了“三年困难时期”，饿得七荤八素；年景转好了，却死了父亲；好容易上学了，又赶上十年“文革”。我1965年上小学，第二年便是“文革”爆发，我看到了红卫兵串联，也看到游街、批斗，暴打当时的县委书记和“地富反坏右”五类分子，忠字舞也跳了几天，但我们地处偏僻的农村，课还是上的。当时为照顾就近入学，我的“小学生涯”的前三年，是在住家附近一个分校点上的。那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农家的偏屋，附近三四个自然村的孩子挤在这里，一边是一年级，另一边是二年级。这就是所谓的“复式”班。一个女老师，这节课给二年级上语文，下一节课便是一年级的算数。这边上课，那边自习，说互不打扰是假的，但基本上可以相安无事。我从小学到初中，除了经常要以“学农”的名义帮生产队干活儿以外，基本上还是按课本上课的，不上课只搞运动，是上了高中以后的事。

上学了，毕竟天地宽了。我打听到学校附近有一家人家，家

里收藏着好多连环画——我们那时都叫小人书，因此想方设法取得了人家的信任，每当放假天雨，便跑到这人家里去看小人书。这家的男主人是在外地工作的，识字不多，买了好多的连环画给自己的孩子们看，没想到便宜了我。我一有机会，就跑到人家那里，趴在人家的炕上，看得如痴如醉，到了吃饭的时候，都要母亲找上门来，拉着我的耳朵，才不情愿地离开。小人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天地。那里不仅有《三打白骨精》、《三打祝家庄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、《牛郎织女》，还有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王二小放牛》、《邱少云》、《小兵张嘎》等等，所以说真正的阅读，我还得说是从看小人书开始的！

小学三四年级以后，小人书已经满足不了我了，因此开始了看“大书”的冒险。那时所谓的“大书”，是相对于小人书而言的，主要是指古典的和现当代的长篇小说。我家世代文盲，自然是没有这些个所谓“大书”的，所看的书主要来自两个方面。一是哥哥借别人的。大我3岁的哥哥此时已经上了初中，经常会拿回来同学的“大书”，这个时候就便宜了我，我会和他抢着看，并且往往会比他先看完。另外就是我自己找别人借。打听到谁家有“大书”，我就会经常往人家跑，直到把书借到手为止。有时为了借到一本好书，还要帮人家做一点事情。有一年，我打听到附近村子里有一家人，家里有《红楼梦》，并且轻易不外借。我窥测了好久，最后，是帮人家打了一天的茬子（玉米的根部，秋收后留在地里，第二年春天用二齿钩子敲出来，用来煮饭），才如愿借到手。以这种方式，到初中毕业，竟然也读了不少的书，比如古典四大名著基本是这时候初次读到的，其他的还有古代的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全传》，现代的如《子夜》、《家

春秋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苦菜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等等，稍微出格一点的，还有插图评话本《西厢记》之类。很难得的，偶尔还有外国文学的翻译本，但多是苏联的，比如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茹尔宾一家人》，最奇特的，竟然还有《伊加利亚旅行记》，还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《怎么办？》。那个时候不知道选择，也没得选择，能找到一本书，就是天大的好事，就如饥似渴、囫圇吞枣地啃完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当时确实天是蓝的，水是清的，但是人是贫困的，精神更是苍白的。在那个知识饥渴的年代，农村基本没有什么文化生活。《地雷战》、《地道战》的电影可以看十几遍，一个大队的文艺宣传队演出就可以轰动十里八村；有一年县剧团演出京剧《红灯记》，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竟然跑了二十多里地、翻过两架大山，以便看看真人版的李铁梅！这样的年代，有一本“大书”看看，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！

当时的阅读也有很大的缺憾。一是没有字典，很多字就是读半边，有些不认识的字也就顺着读过去了，基本意思明白就算是读过了。这种读书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不少“定时炸弹”，许多的字，似曾相识，不求甚解，即使意思是明了的，但到今天还会读错。我真正接触字典，是在上大学以后。由于痛感以前这方面训练不够，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从每月 18.5 元的助学金里面，省下几元钱，先买了一本《辞源》。也是感觉自己的先天不足，大学的大门进去了，选择专业的小门的时候，我没有去钻研古文字、金石甲骨之类，而选择北方地区青铜器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。第二个不足是由于处于穷乡僻壤，在早期的阅读中只能读到些小说之类，基本没有接触到古代经典，比如《诗经》、《老子》、

唐诗宋词之类，因此在自己的阅读中缺少一点古典式的文化熏陶。我第一次读《唐诗三百首》要晚到大一的时候，还好的是，大学图书馆让我在此时恶补了这方面的缺憾。记得初中的时候有人借给我一套《纲鉴易知录》，但以我当时的水平，这书是无论如何也读不进去的，因此很快就还给了人家。不过这个书名我是记得很牢，大学毕业后，有钱买书了，很快就自己买了一套，浏览了一过。第三个是读书基本上都是看热闹。现当代小说，打仗的不说了，不打仗的，也是多挑对话看，对于场景和人物内心的思考与活动注意不够。古典小说，水浒、三国、西游还好，《红楼梦》其实初次接触时大部分是不懂的，因此以后又回过头来读了很多次；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也只记住了冬妮娅的美丽、保尔的坚强；《伊加利亚旅行记》是一本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读物，但那时根本不懂，因为故事情节不强，所以并没有看完，但是作品里描述的伊加利亚地方的“共产主义”式的生活，至今仍有印象。《怎么办？》根本不懂，翻了翻就放下了。

今天回想起来似乎简单，但当时能够读下几本书是很不容易的。首先是生计所迫，时间太少。前面说过，父亲去世很早，家里的生活担子就是母亲一人承担，她每天像一个男劳动力一样，起早贪黑，下田干活，维持着能把全家人口粮领回来的程度，如若不然，我们就要挨饿了。知道母亲不易，我很小就到队里干活挣工分了。小到什么时候？应该是9岁或者10岁吧！别的暂时做不好，插秧是可以的，我最早的劳动所得就是插秧挣的工分。大人说，小孩子没有腰，最适合插秧。我那时插秧效率挺高，每天和小伙伴要完成大约一亩地的样子。从此开始，每到放假就要到生产队里干活。那时的学校作息，是周三下午放假，周日一天

假，另外就是寒暑假。而放假时队里有适合半大孩子干的活我都会去。劳动所得的工分，开始是成年人的一半，到了初二，差不多就挣整劳力的工分了。积少成多，初一的时候我挣的工分已经可以领回自己的口粮，到了中学时代，水田旱田，各色农活之中，除了赶马车，几乎所有的我都做过了。近些年，我常常发着这样的“宏愿”：把我那个时候干过的农活一一介绍一遍，让今天的年轻人知道改革开放之前农民的不易。

少年无知，那时最大的愿望是放假的时候刮风下雨，因为那样就可以不必到地里干活，而可以蹲在家里看书了。此想法真是天真！不去生产队里干活，家里吃什么？因此尽管这样想着，每逢假日，还是要去队里干活。那时的农活也真多！春天刚化冻就要水稻育苗，之后接上的是旱田播种，之后没几天就要水稻插秧。插完秧没等你直一下腰，就要旱田锄草，莠弄完旱田的杂草就该水田除草了。水田除草正是雨季，天雨霖霖，在水田里弯着腰，把每一墩水稻根部的杂草用手薅掉，水里又有甲虫蚂蝗，真的是苦极了！水稻除完草正是暑天，要给玉米追施化肥，此时的玉米已经有人头多高，天气暑热，人光着膀子穿行其中，一趟下来，玉米叶子上的倒齿会把你身上划得火辣辣的。挨过秋收，庄稼上场，天气开始变冷的时候，是水稻脱粒。这也是一个苦活，而且由于当时经常停电，白天无法开动电动脱粒机，只有晚上干。往往是半夜十一二点来电，这时就要从热被窝里爬出来，到场院去接受灰土和稻芒的洗礼。好容易冬天了，也消停不下来。当时的冬天就是农业学大寨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，或者修河堤，或者修梯田，实在没事，就到河里取出淤泥，再人工运到山上去，改善农田的土质。不是假期也闲不下来，因为家里要养猪、

养鸡，还有一点自留地、菜地需要打理。这样，平时下课后，不是要割草拾粪，就是要放猪担土，再不就是除草积肥，没有闲的时候。冬天了，还要到野地里搂草。我们住的地方没有山，也买不起煤，平时烧火做饭，就是秸秆稻草，故此冬天时要搂草，也就是把野外的树叶枯草用篮子一点一点地收集起来，背回家里当柴火用。母亲对我和哥哥的要求，就是一个冬天搂的草要供得上日常做饭，还要攒下明春的烧草。

想一想，有这么多的事要做，还剩下多少读书的时间呢？所以那时有一点时间，我就钻进屋里，抱起书本，但也往往是没翻上两页，母亲就喊我了，告诉有新的活儿要我去干。当我反应慢了，她老人家就会威胁烧了我的书。我看的书都是借人家的，岂能被烧？因此我也想了一些办法，比如把书藏起来。冬天我会把书藏到屋后大梨树的树洞里，但次数多了，也被她老人家发现了，因此我被狠狠地“体罚”了一次。

今天回想起来，那个时候的好书太少了，阅读条件也太差了！好书太少不说了。当时基本上是碰上什么就读什么，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系统，并且所读的书被人翻得次数太多，书页半数是卷起来的，前言后记能保存下来就算好的了，有些书往往是在关键时刻，后面却没有了，那时的心情可真是提不起放不下啊！

讲到阅读条件，“文革”前后的东北农村，几乎每家都是没有书桌的。我家只有一个吃饭的炕桌，要看书，只有趴在窗台上或土炕上。白天没有时间，只有晚上看。我的家乡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才通了电，但是由于缺少电力，经常停电，因此晚上看书就要靠油灯。光线不好不说，母亲担心熬油花钱，时不时地还要唠叨两句。但一旦抱起书本，母亲的唠叨也就听不到了。由

于书是借人家的，逾期不还以后难以再借，所以就是点灯熬油，也是要尽快看完。由于好书难得，偶尔到手，便一读再读。譬如《水浒》我就读过好多遍。书中一百零八将的星宿、绰号、排位，都能背诵；哪位好汉在哪一回登场，谁引出他，他又引出谁，也记得清楚。一些句子，譬如“那厮”、“那雪下得正紧”，甚至经常出现在我和伙伴们的谈话之中。

我成长的时期正是“文革”中期，政治严酷，看一本书也得偷偷摸摸。我上小学到中学的时候，除了当红的文学作品，比如《艳阳天》、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虹南作战史》等之外，不说《西厢记》了，就是《平原游击队》、《烈火金刚》、《红岩》也都在禁书之列。好在小学的时候，农村还没有人管这个，农民邻居都是文盲半文盲，也不管你看的是什么。但也有“警惕性”高的，把《小五义》包上个“毛选”的书皮。上中学后就不行了。我上中学已经是“文革”后期了，那所中学是毛远新抓的点，是教育改革的试验田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很紧，同学们换个书看，都要偷着来，一不小心，被老师发现了，轻则批评，重了要没收。有一次，一位女同学借了我一本《晋阳秋》，我没藏好，就被班主任没收了，还在全体同学面前大批了一通，说《晋阳秋》宣传的是投降主义，是大毒草。直到中学毕业，我也不知道那本书还给那位女同学没有，搞得我现在还觉得对她不起。

“革命”中的阅读

其实是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，实在没有东西可读，我就已经开始把姐姐的高中课本作为我的课外读物了。“文革”前的高

中语文、地理、历史，还是很有些内容的。架不住时间长，到初中的时候，那些内容我已经很熟了。一些文学名篇，比如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、《捕蛇者说》、《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》及不少鲁迅的作品都是在这时接触的，而对于一些历史沿革、地理区划与国家首都也基本上是烂熟于心了，惟其如此，尽管我在1974年到1976年的中学生涯里基本上什么都没学到，还是可以靠着历史与地理的高分考进大学。

不过要说中学的时候什么都没学到也不完全对。我上中学，也就是今天的高中，是1974年，那年我16岁。前面说过，我的中学，也就是辽宁省东沟县小甸子中学，离我的家很远，我每天要走大约七八公里去上学，这样加上放学，每天就要走路15公里的样子，途中还要翻过一架不高不矮的山梁。在冬天的时候，便是两头不见天日，好在那时也没有什么教材，书包里就是一只饭盒。

当时我们的中学是毛远新抓的“点”，是“教育改革”的先进单位。所谓教育改革是什么呢？就是“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”，就是“农民需要什么，我们就学什么”。在这个宗旨之下，我们入学没几天，就被分成政文、农电、卫生、财会等专业班，自编教材，号称分别为农村培养宣传、财务、农业机电、赤脚医生等人才。我因为比较喜欢语文，就报了政文班。两年里，我们的“开门办学”，就是以“批判资本主义”为主要内容。

1975年春，姚文元发表《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》，我们班就派出班干部，参加批判资本主义的工作队，到生产队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我在一个生产队足足待了三个月，每天白天下地，晚上开会，学习“继续革命理论”，要求农民割资本主义尾巴。和我一起的工作队员，还有两位是社会上的党员。他们因

为有家，隔三差五的就跑到家里去了，我是学生，不敢“自由主义”，就一直在那里待着。后来张春桥发表《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》，我们班级又组织了三四个小分队，到下面的生产队去“打资产阶级的土围子”。我是一个小分队的队长，我们住在农民家里，自己开伙做饭，白天和农民一起劳动，晚上组织农民学习。1976年“天安门事件”发生时，我们还在生产队里，和社员一起学报纸，批邓、反击右倾翻案风。记得很清楚的是，和同学们一起学习，我那时不知天高地厚，直接就说“天安门事件”中群众骂的“戴眼镜的秀才”就是指张春桥、姚文元。幸亏当时已经是“文革”后期，也没人举报了。

这种活动之外，中学还组织各种名目的社会劳动，比如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就在一个秋天里，拿出好多天，把一面山坡修成梯田，挖好树坑，入冬后，再利用晚上的时间，冒着寒风，从几公里外的河滩人拉肩挑，运来肥沃的泥土填进树坑，准备建成果园。惜乎果园建成之时，我们已是毕业多年，也没有享受到果实。

中学两年，这样的事情做了不少，课自然也就上得少。当时高中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是根本不开课的，就是政治和语文，内容也不离当时的现实政治。但是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两位“文革”前的北师大的高材生，男的叫黄凤炎，是哲学系的；女的叫王正志，是物理系的。他们两位因为“文革”，被发配到我们那里，一待就是七八年。“文革”之后，1978年，黄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研究人员，王则是首批留美的博士生，当时她们家兄妹三个同时考取留学生，留学美国，照片还上了《人民日报》。今天记忆犹新的一件事，是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去世。当

时国内的报纸没有什么悼念的内容，王正志老师便给我们读《参考消息》上的外国政要的悼念文字，边读边抽泣，给我们这些中学生很大震撼。说真的，我们这些人，“文革”期间长大的，对周总理还真没有什么很特殊的感情，但经过这一天，我们的想法不同了。

当时这两位老师还是很想教给我们一些东西的，黄老师自己编写了哲学、政治经济学和新闻报道的教材，所以我在那时就接触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；文学方面，因为主要强调适合农村需要，所以学了新闻报道的写法、五个W之类。大概是得益于这两位老师的教育吧？我们班的学生后来有五六十个人陆续考上了大学，在那前后毕业的学生中也是少见的。

黄老师很喜欢我，课余介绍了不少书籍给我看，印象特别深的，是鲁迅的作品，还有高尔基的《我的大学》，美国两位卡尔布的《基辛格》，还有翻译自苏联的《落角》和《多雪的冬天》。当时中苏关系还很紧张，译自苏联的文学作品很少见，“文革”后期，国内出版了一批“灰皮书”，主要是翻译的作品，这两本就是其中的两种，因为是内部发行，读起来格外兴奋。

但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鲁迅的作品，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。

一是更广阔的文学世界。鲁迅的作品，之前也读过一些，但都是比较浅显的，比如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、《闰土》、《社戏》等，这时读到的《故事新编》、《彷徨》、《呐喊》等，几乎是鲁迅全部的文学作品。《狂人日记》的呼喊，《阿Q正传》、《药》的深刻，《理水》的幽默，都给我打开了新的天地，尤其是《故

事新编》里的那些作品，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，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，令我大开眼界。

二是语言风格。鲁迅的杂文集《坟》、《热风》、《华盖集》、《华盖集续编》、《三闲集》、《二心集》、《南腔北调集》、《伪自由书》、《准风月谈》、《花边文学》、《且介亭杂文》、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等，我是在这个时期一口气读完的。在这里，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，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，其中有无情的揭露，有愤怒的控诉，有尖锐的批判，有辛辣的讽刺，有机智的幽默，有细致的分析，有果决的论断，有激情的抒发，有痛苦的呐喊，有亲切的鼓励，有热烈的赞颂，笔锋驰骋纵横，词采飞扬，形式多样，变化多端，读起来简直是过瘾极了。

三是民国时代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。鲁迅作品，尤其是杂文，大多直击当时的社会和人，内中有太大的信息量，尽管我当时阅读的选集基本没有注释，但鲁迅的作品里引用了很多论敌的话，前后对照，穿插阅读，还是令我得到了极大的乐趣，尤其是鲁迅文中涉及到的文坛人物和流派，比如语丝派、新月派、学衡派，周作人、顾颉刚、张资平、陈西滢、林语堂、胡风、高长虹等，当时都没有机会深入了解，从而给我留下很大的悬念，引导我进一步去探究他们的生平和政治取向，而“四条汉子”、茅盾、郭沫若等在“文革”中经常会见到，郭沫若且是当时很红的人物，他们在历史上同鲁迅的关系也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。我当时也不可能知道，鲁迅作品中提到的商务印书馆、世界书局、开明书店、生活书店等机构后来会与我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，并且我会成为生活书店事业的继承者之一。